

1978年9月20日 星 期 三
农历戊午年八月十八 第 1 1 0 3 0 号

1978年9月20日 星 期 三
农历戊午年八月十八 第 1 1 0 3 0 号

拉瓦尔品第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
齐亚·哈克将军阁下：

值此阁下就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之际，
我们谨向阁下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叶剑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九日于北京

开得好，开得及时，它体现了党的按劳分配政策。广大工人纷纷表示，一定要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造成“生产优质品

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

任仲夷

—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示我们：“应该大力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邓副主席也一再强调实事求是，不久前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又一次专门讲了实事求是问题，指出：“实事求是，是毛主席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我们必须懂得，要不要实事求是，说到底，是搞唯物主义，还是搞唯心主义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理论问题。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以“左”的面目出现，打着“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旗号，肆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践、政治与经济、个人与群众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制造了很多混乱，搞得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空气甚浓。现在要澄清“四人帮”造成的混乱，就必须大力提倡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这是一面照妖镜。在它面前，一切伪理论、伪科学、假左骗局、假右原形毕露。有了实事求是这个武器，禁区可以突破，思想可以解放，工作可以高速度地前进。联系我们的实际工作想一想，实事求是是个问题，确实太重要了。没有实事求是，对“四人帮”的许多假左真右的谬论就不能批、不敢批；没有实事求是，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文艺战线的“黑线专政论”等等都不可能推倒；没有实事求是，干部政策无法落实，大量的假案、冤案、错案也不可能平反昭雪；没有实事求是，经济工作中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都不可能实行。回顾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斗争历程，我们各条战线的工作，每前进一步，都是坚持实事求是，对“四人帮”歪曲毛泽东思想而设置的“禁区”的一个突破。就重大一点，前进一步，都是突破大一些，前进的步子就突破大一些。今后，我们要在抓纲治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上以更大的步伐前进，使发展速度更快，就必须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有更大的突破，思想有更大的解放。而要做到这一点，根本的一条是实事求是。现在华主席、党中央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中央报刊大力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实打中了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动思想体系的要害，是理论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二

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是在同机会主义路线的长期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锐利武器。在党的历史上，王明自命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使革命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毛主席同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间发动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对机会主义路线和党内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清算。毛主席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光辉著作中，深刻地系统地阐述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批判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主观主义“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性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改造我们的学习》）经过延安整风，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全党大大发扬，中国革命从此迅速发展，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主席在全党全国树立的实事求是之风，近十几年来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他们在党内党外大搞唯心主义，大搞假左假右，欺骗迷惑了不少人。外国因内而起作用。如果从主观上总结教训，就会发现，我们的同志所以上当受骗，本身有些糊涂思想是起了作用的。在我们辽宁常听到的有以下几种糊涂说法：一是迷信“特殊身份”。有些同志对“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所鼓吹的东西，有时也觉得不对劲，但因为是这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人讲的，就不敢怀疑，只好“不理解的也执行”。上当受骗在哪里呢？就在于不敢实事求是。固然，那个死党常常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讲话，引用毛主席的片言只语，有它欺骗性的一面；但是，经过他歪曲篡改的那些话，已经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根本不符合实际，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所以，这又是可以识别的。我们的同志多年不学马列，又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结果就迷信他。所谓“特殊身份”，不仅这个死党有，江青也有。林彪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有很高的地位和非同寻常的“身份”。如果迷信“特殊身份”，他们都能成为迷信的对象。由于迷信“特殊身份”，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了，马列主义的觉悟没有了，党性没有了，这是一条深刻的教训。

二是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看问题。朴素的阶级感情是好的，但那是很不够的。林彪说过很多“颂扬”毛主席的话，例如说毛主席是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要“句句照办”，等等。这些本是林彪打着“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旗号来树他自己、同时贬低和打击别人的一种阴险诡计，而我们有些同志不去分析这些话是否合乎科学，是否合乎实际，却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看问题，盲目认为“只要是颂扬毛主席的话，怎么说也不过分”，“即使不准确，也是好的”。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的高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都反对把他们神化和对他们过分地颂扬。毛主席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和林彪别有用心地的“颂扬”，作了许多极为深刻的批判。我们热爱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并且要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但是，决不能用唯心主义的态度去“热爱”，去“高举”，而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去对待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应当很好地总结和汲取的又一条重要历史教训。

三是把政治上的需要和实事求是对立起来。“四人帮”横行时期，毛主席的许多重要教导成了忌语，不提。生产是中心，不不提；按劳分配，不提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不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提了；安定团结，不提了；一切划“左”的话，都不准提了，等等。我们有些同志没有看出这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行径，当时却以为是政治上的需要。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对于许多拨乱反正的提法和做法，有的同志还认为，虽然理论上实际上都是对的，但政治上不可以，或不大好。这是什么问题呢？实际上还是不敢实事求是。无产阶级专政决不需要反对理论上正确的东西，理论上错误的东西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当然，在宣传上，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但是，正如不能把错误的说成正确的一样，也决不能把正确的说成错误的。

总之，越是认真回顾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训，越觉得实事求是重要。在我们的历史上，什么时候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唯心主义占了上风，革命就遭受挫折和失败；什么时候实事求是之风、理论联系实际之风盛行，革命就胜利前进。对那种反对实事求是的思潮如果不予制止，不拨乱反正，它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正如胡乔木最近指出的：“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

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 加快前进步伐

广东召开省委常委和省委会副主任学习会，联系实际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省委第二书记记仲勋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绝不

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问题

新华社广州九月十九日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着重大现实意义、针对性很强的实践问题。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在学习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

广东省委在当前抓纲治国的斗争中，反复强调要从思想政治路线上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打破精神枷锁，拨乱反正。为了武装自己的头脑，在最近召开的省委常委和省委会副任的学习会上，大家重温了毛主席在《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著作中阐述的基本思想，联系广东实际，专门讨论了真理的标准问题。

大家认为，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必须联系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打破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各种“禁区”，通过学习和批判，使思想得到大解放，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的作风。搞清楚这个问题有着重大意义，这是关系到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和国家前途的大问题。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记仲勋在学习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常识问题。毛主席对此曾经作过深刻的论述，题目就是《实践论》。毛主席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对这个问题感触太深了。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着重大实践意义的问题。他说，林彪、“四人帮”大搞唯心论、形而上学，疯狂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林彪极力鼓吹“顶峰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完全是政治骗子的行径。他们的卑鄙用心，就是要借毛主席的威望来捞取个人的政治资本。他们鼓吹的这一套，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用实践来检验真理，这是

一个完整的过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发展。讲“顶峰”，那不是不要发展了吗？林彪、“四人帮”的这些说法，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仲勋同志指出，林彪还大搞实用主义，鼓吹什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这是糟蹋马克思主义，它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按照他们这一套谬论，马克思主义就不需要系统学了，不需要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了。既然是“一句顶一万句”，只要抓住片言只语，就可以包治百病，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根本不需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需要根据时间、地点、条件来处理问题。事实上，林彪、“四人帮”也正是这样干的，他们成天抓片言只语，就可以以抓人、杀人。在广东，他们在这方面犯下了滔天罪行，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他们为了破坏广东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把“以粮为纲，全面学”的方针，变成了“以粮惟一”，大砍经济作物。形而上学的灾祸，使广东农业受到严重破坏，使农民深受其害。

仲勋同志说，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我们要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学习，再学习。要把广东全省的工作搞好，就要学习马。要配合当前的整风，广泛开展学习运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好好学习。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毛主席总结了中国的革命的经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领会其精神实质，学习毛主席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是去抄现成的公式，抓住片言只语去到处套用。那种把马列和毛主席的话当成死的教条，拿个别词句去生搬硬套，那不是真正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而恰恰是糟蹋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三

的失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现在，我们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新的长征，就非得大兴实事求是之风不可。

实事求是，说来简单，真正做起来并不是很容易的。

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本身就教导人们要实事求是。它要求人们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而不是拘守个别论断；要求人们善于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联系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从实际出发去解决各种問題，而不是不顾客观实际，片面地甚至歪曲地抓住个别词句不放。毛主席早就指出：“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毛主席生前对某些问题的提法，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发展，也是常有补充、修改和发展的。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讲得很清楚：“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范围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新未料到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毛主席在这里生动地表述了人们认识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它说明人们的认识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成。我们深信，毛主席如果健在，他绝不会只讲过去已经讲过的话，而肯定会根据新的情况不断作出新的指示，还会根据新的情况对过去的某些具体提法作出修改和补充。现在毛主席已经离开了我们，难道因此毛泽东思想就应当不再发展了吗？难道一切个别词句和个别论断都应当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吗？绝不能那样。如果那样，我们就不能前进了，我们就只能从“本本”出发而不能从实际出发。那样就不能从本本上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只有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避免主观主义，决定问题和处理问题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符合客观实际。“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情况，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少数机关凭片面地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另外，只有实行民主集中制，人们才敢于实事求是。过去林彪、“四人帮”在党内党外大搞法西斯专政，造成人们不敢讲真话，“四人帮”的那个死党在辽宁做了多年的“太上皇”，施尽了法西斯淫威，把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践踏得不成样子。谁讲一点和他们不同的意见，他们就对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施以野蛮的肉体摧残和政治迫害，并且株连家属亲友，搞得人人自危，一片恐怖。在这样一种气氛下，还能有多少实事求是的风气呢？我们现在要大兴实事求是之风，就必须反林彪、“四人帮”之道而行之，在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真正使问题反映，让干部和群众讲话，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是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作风的重要组织保证。当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不应当因有“风险”就不实事求是。从组织方面来讲，应当强调充分发扬民主，真正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主义”；而对于个人，则应当提倡无私奉献，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革命风格。应该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永远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时刻倾听群众

的呼声。人民群众是三大革命的实践者，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功过是非最公正的判罪者。群众的意志，人心的向背，归根到底是不可抗拒的。“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专门干广大群众反对的事，积怨甚多，不得人心，终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人民群众心连心，各项决策都符合人民群众的心愿，因而立于不败之地。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作为我们行政政策的根据。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是听从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我们做工作，执行政策，一定要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了解群众的心脉，知道人心的向背，倾听群众的呼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不脱离群众，使我们的政策、办法符合客观实际，得到成功。

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承认实践高于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的认识正确与否，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实践可能证明原来的认识是正确的，也可能证明原来的认识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从而改变、补充、发展原来的认识。这是认识过程的又一次飞跃。毛主席说：“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尊重社会实践，那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践高于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贬低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恰恰相反，这正是捍卫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对。有的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第一，毛泽东思想本身是真理，而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们常讲，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正确的，这并不能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所以坚信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它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正如毛主席在论述马克思主义时指出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知’，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第二，对毛主席的许多具体指示，人们有时候有不同的理解。究竟哪种理解对，最终还是要靠实践来检验。第三，毛泽东思想不可能包括现在和将来人们社会实践中的一切情况和细节。不仅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不可能从毛主席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大量具体问题，也不能可能从“本本”中找到现成答案。而只有实践才能够回答一切。正如列宁所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着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现实性的优点。”（《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三八卷第二三〇页）列宁又说：“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至于具体情况，实际情况，那只有千百万人的实践过程才能表明。”（《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七三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只有坚持这个认识，才能在理论上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流毒，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总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和根本态度。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长期斗争过程中亲自倡导、一贯强调的这种根本观点，是不会过时的。它永远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华主席、党中央大力强调实事求是，这是当前理论上最大的拨乱反正，它必将给人们的思想带来更大的解放，使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迈开更大步伐的步伐。

（原载《理论与实践》一九七八年第八、九期）

文艺工作者的历史职责

本报评论员

中央戏剧学院创作、演出的话剧《杨开慧》，成功地塑造了青年时代的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杨开慧烈士的艺术形象，在观众中引起热烈的反响。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上一次新的尝试，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新成果。

半个多世纪以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辉煌胜利。如今，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已经离开了我们。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把他们开创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在这个继往开来的时代，英雄领袖毛主席号召文艺工作者树立雄心壮志，努力创作反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反映在我们党领导下，人民革命斗争的奋斗历程的优秀作品。通过讴歌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继承光荣传统，发扬革命精神，跟随毛主席进行新的长征。完成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职责。

林彪、“四人帮”伙计挥舞着“不能给老家伙树碑立传”的大棒，猖狂地封禁和扼杀一大批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反映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和革命回忆录。这是他们阴谋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一部分。林彪、“四人帮”的余毒远远没有肃清。例如，现在仍然有人认为，革命历史题材并“不能直接同现实生活提出来的各种各样需要回答的问题”，因而不能列入“现代革命题材”。按照这种论调，岂不是又回到林彪、“四人帮”假左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去了吗？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文艺工作者努力在戏剧舞台上塑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以及董必武、贺龙、陈毅、罗荣桓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话剧《杨开慧》、《报童》、《西安事变》、《东进东进》、《曙光》等，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剧目。深情歌颂周总理的优秀话剧《丹心谱》，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赞扬。文艺工作者艺术上的这一可贵创举和勇敢探索，表达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但是，当前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艺术形象的作品还太少，远远满足不了我国各族人民的要求。

同时，塑造革命领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是我国文艺创作上的新课题，是一项极其严肃而又紧迫的政治任务，在艺术创造上，既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又要认真谨慎，从严要求。要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

要认真解决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戏剧、电影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同塑造其他艺术形象一样，必须遵循艺术典型化的创作规律，从生活出发，对历史环境和人物性格进行典型概括，允许虚构，允许虚构。但由于写的是真人，所以在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时，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史实，主要人物的主要历史事迹，不能虚构，不能杜撰。某些虚构的部分必须符合历史背景和历史人物的本质特征，不顾历史真实，随意虚构和编造是不对的。但是，要求文艺作品事有实据，人人有原型，字字有出处，跟历史文献或党史讲义一样准确，就不利于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动感人的典型形象。

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无论是虚写还是实写，无论是在关键时刻出场还是处于矛盾冲突的核心，都要解决好形似和神似相结合的问题。要以形写神，形神兼备。首先要做到形似，外貌、举止、神态要尽量逼真。任何对外部形象不严肃、草率从事都是不应该的。但更重要的是注意内容，注重神似。要尽可能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放在决定历史进程的重要位置上，把他们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不朽功绩，确切、充分地反映出来，把他们崇高的思想品德和博大的胸襟，形象、生动地再现出来，努力做到形似和神似相结合。

“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叶副主席的光辉诗句，表达了我们对毛主席，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心情。我们期望文艺工作者群策群力，再接再厉，以更优异的成绩，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重庆工人、黄陵农民的雕塑来北京展出，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这个展览会的显著特点之一，是陈列着不少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既表现出工农业业余作者的革命感情，也反映了广大观众对雕塑艺术的爱好。

圆雕《针锋相对》取材于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一九四一年在重庆作家亲自散发的《新华日报》的动人情景，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好作品。我说它好，主要是指它的选材有个性。这就是说，正如要有关南昌建立周恩来同志塑像，最好是选择与八一起义有关的题材那样，题材的个性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想，如果进一步探讨《针锋相对》所再现的生活内容的特殊性，按照纪念碑艺术特点的要求，在形体结构的建筑性等方面精益求精，反复推敲，力求求得情节的具体性和形象的概括性的对立统一，然后将它铸铜或刻石，矗立在重庆的革命广场，定能使广大群众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深切感受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精神和巧妙的斗争艺术，从而更大发挥雕塑艺术强大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革命作用。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光荣战斗的历史，有灿烂辉煌的科学技术文化，有历代人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有在历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杰出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有优美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以及能够引起美感的各种各样的动物，……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今天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的现实生活，都需要我们专业和业余的雕塑工作者去再现和表现。我们的国家有这么多的城市有待于美化，需要建立大量纪念碑雕塑以及大量的装饰雕塑。如何使革命的雕塑艺术与各个有特点的城市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相适应，使雕塑艺术在一个新天地里更富于创造性地发展起来，成为社会主义祖国城市建设或园林装饰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有待于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和建筑家、雕塑家共同努力的一个重要任务。

怎样使雕塑艺术适应不同的城市建设的特殊需要，怎样使形象更加典型化，怎样体现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是雕塑艺术在社会主义时代能不能百花齐放方针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承认，纪念碑雕塑在我们的城市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题材不是太广泛而是太狭窄，形式风格不是太丰富而是太单调，其中富有高度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就更少。我在这里并不是在提倡铺张和浪费，但是设想一下，象《针锋相对》这样的作品，如果经过进一步的加工，作为一座纪念碑雕塑，出现在与题材有密切联系

话剧《杨开慧》观后感

李之华

话剧《杨开慧》最后一个场景：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五朵缤纷的礼花化为湘江的景色，一江春水环绕岳麓缓缓北去，江鸟在水面上展翅凌空……

青年时代的毛主席和杨开慧烈士并肩来到江边，漫步在盛开的梅花丛中。白云从他们头上飞过，江涛在他们脚下泛起。

传来朗诵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长沙》下阕的声音：“携来百侣曾游……”乐声中，毛主席和杨开慧烈士穿过梅花丛，向我们走来，走来，走来。

观众的心也向毛主席和杨开慧烈士走去，走去，走去。

大幕好象也有知觉，善于体会观众的心情——徐徐地闭上又马上拉开。全场爆发出暴风雨一般的掌声，演员与观众的热情汇成一片。剧场里的灯通通亮了，观众还留恋着，依依不肯离去。

走出剧场的大门，舞台幻觉境界的艺术形象还萦绕在脑际，突然一阵清风习习地浸润着温暖的肌肤，石阶上闪闪发光的雨水，告诉人们在演出过程当中剧场外面曾经下过一场小小的雷阵雨。呵，是的，在演出之前，观众刚来到剧场门口，看见花荫深处有燕子低飞，黄昏将逝的夜空有大块乌云遮住了明月。那时，正是阵雨雷欲来未到的时刻；而雨后天晴，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挂在碧海似的青天之上。眼前的生活实践和脑子里的艺术幻境互相一对照，我恍然大悟到——剧中所表现的伟大斗争（1920—1930）一场壮丽的斗争，原来是被集中、概括、凝炼、诗化在演出不到三小时的话剧艺术之中。这本来在“说明书”上早已看到了，现在却好象新发现一样，从内心深处生出一种惊喜的欣喜。

“一场骤雨过去，十年星火已燎原”。这种漫长的十年间与美丽的三小时的对照；这种伟大的峥嵘岁月与短暂的灿烂火花花的对照；这种无比生活丰富的生活源泉与匠心独运的艺术升华的对照；这种生活的美与艺术的美的对照，使它们想到两者之间可以互相转化，却绝不可以互相代替，而且，人民群众对于后者的需要是绝对不次于前者的，这从观众刚才的热烈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应当感谢作者、导演、演员、舞台工作者的辛勤劳动。

长安街旁的林荫道上，洒满了婆娑的树影，月光穿过树叶之间的空隙倾泻下来，地上的小水洼闪烁着晶莹的亮光。清风徐来，偶尔从树上滴下一两颗珍珠般的水点儿。在这空气清新而新凉的夜晚，漫步在这林荫道上，谛听着观众的即兴的评论，回味着剧中的诗情——

话剧《杨开慧》的确是一篇“诗剧”，一开篇就诗意盎然，春风扑面。晨雾弥漫的湘江之滨，站立着杨开慧。传来朗诵毛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长沙》上阕的声音“独立寒秋……”她在思考着：“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种有关戏剧主题哲理式的发问，一呼一应，在戏的结尾朗诵同一诗词下阕中得到了回答。是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人民群众，是主宰大地沉浮的革命力量写成了这首壮丽的诗篇。

戏剧的动作是以杨开慧一生革命斗争生活为主要贯穿线索的。这一曲悲壮的革命交响诗，有一个运用“比、兴”手法而富有诗意的乐音不断出现——那就是象征性的“火”的旋律。由毛主席点燃的在戏中第一次出现的火把，象征着光明，温暖，革命和工农，那些诗意的台词这里就不举了，最后，毛主席对着岸英说：“小岸英呵，你长大以后也要成为一团火！”以后，这个“火”的旋律在戏剧进行当中有几次巧妙地出现。当杨开慧烈士被捕入狱，小岸英伴随着妈妈时梦见爸爸来了，给岸英带来一只大火把，说：“英伢子，去把那一座座监狱都烧成灰！”这不仅为“火”的旋律的出现形成了前后的呼应，而且加深了我们的和剧中人一起对于毛主席的怀念。“火”的旋律总是和基调交织在一起的。下边是杨开慧烈士在狱中想念毛主席的场景。杨开慧：

“天阴了，我要走了！我是在严冬季节走的，天气阴寒寒冷，风刮得很猛，雪下得很深；但是当我想到了你，想到你在井冈山点燃的那片将要照亮整个中国的熊熊烈火，我的心中就出现了一个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春天。……”动人的场面进行下去，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杨开慧烈士想念毛主席的心太深切了，于是红旗飘扬的群山之间出现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巍然屹立在群山之上。在毛主席鼓励激励烈士之后，杨开慧：（闪烁着泪花）润芝：毛主席：（无限深情地）永别了，我没有别的东西送给你作为纪念，我想送给你两个字——杨，你是我的杨，你象是中国人民的杨！杨开慧：（热泪夺眶而出）润芝！接着幻象隐去，泪光莹莹的杨开慧激动地凝望着远方，……天幕上出现燎原的大火。“火”的旋律在这里达到了最强音，“火”的象征到这里达到最高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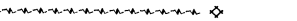
戏中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青年时代的艺术形象塑造得非常成功。这在我国舞台上还是第一次。过去，有的戏虽也有毛主席出现的场面，但只是有两段台词。这又一次不同，毛主席的艺术形象贯穿始终。青年时代的毛主席的平易近人，

谈笑风生，诗情满怀，雄姿英发，拍案而起等革命风貌，塑造得栩栩如生，亲切动人。毛主席革命路线在与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农民运动“好得很”与“糟得很”的斗争的情景，在戏里都表现得非常具体而生动。戏里还表现了当年敬爱的周总理和蔡和森同志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毛主席并肩作战，以武装斗争为主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斗争。毛主席树立的井冈山革命红旗，指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方向。戏中杨开慧烈士的崇高形象被塑造得如同玉树临风，诗意盎然。她的洁白的一生，她的壮丽的一生，只有“骄杨”二字才能概括。她屹立于革命战士的万木丛中，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里，她的浓密深厚的绿枝叶盖着幼松，矫健挺拔的顶尖直刺着青天。忠贞不屈，宁折不倒，只有她能担当得起“骄杨”二字的美喻。她不幸惨遭反革命的杀害，忠魂化为一团烈火，与燎原的红焰熔成一片，对准反革命猛烈地燃烧起来。她用生命写出一首悲壮的诗歌。

戏中与杨开慧烈士对立的角色是叛徒黄亚非。她象靡罗一样依附地生长在儿子的、国民党反动派泥淖里，这就是她成为陈独秀信徒——右倾机会主义者，终于走上叛徒、特务的可耻道路的原因。“藤萝绕树生，树倒藤必死”，叛徒黄所代表的反动黑势力必然要灭亡的命运在等待着她。

杨开慧的女战友——方辉的形象塑造得非常生动，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她象一株从岩石底下经过断裂的缺口挣扎出来的劲竹。她的植生于岩石下的弯曲曲折的苦根，她的遒劲挺拔的枝叶，不管是多么厉害的迅雷、烈风、暴雨、严霜都毁不了她。她永远挺拔多姿地挺立在多变的风雨晦明的气候之中，即使她的枝叶受到严酷的摧残，但她的苦根不死，仍能从岩石裂缝里生出新笋新枝，顽强地战斗下去。

剧中的声音突断了不断闪现在脑海之中，我不知不觉地去了天安门广场。月光象透明的轻纱笼罩着广阔的天空，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然耸立，毛主席纪念馆高耸大巍峨。面对着这月下的情景，思绪万千。记得有这样的两句诗：“今人不识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这些革命的后来者，是并没有见过当年照耀着井冈山革命红旗的明月的，今年今天抬头望见的明月，却曾经照射过杨开慧、蔡和森……无数革命先烈，在这千星流霜的月光之下，怀念杨开慧烈士，怀念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想到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经过许多曲折流到现在，红色江山得来不易，巩固、建设和发展更不易。



的精神面貌。反对只求模拟人物的外貌而忽视深入探索人物的内在精神，即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虚构与浮夸。希望我们塑造伟大领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时，能够运用最动人最耐看的形式，把他们性格中存在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对立统一、伟大崇高与平易近人的对立统一……生动地也较集中地表现出来，使作品的政治性与艺术性达到和谐的统一，使这些作品在今天、明天直至永远都能感动群众和教育群众。

近两年来，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全国的专业和业余雕塑工作者为摆脱“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创造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欢迎的雕塑艺术做出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目前在某些作品中，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拘泥于事物的表面现象，不善于深入体验和表现人物心灵和事物本质等缺点，但我相信，只要努力培养对生活敏锐的感受能力和对生活深刻的认识能力，在不断深入和研究丰富多彩的生活，力求具体而又概括地掌握那些首先感动过自己，而且也是生活中最精美最动人的东西，永远不简单地把他人的劳动成果当作自己的模仿对象……，那就完全可以预言，今后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雕塑新作问世。

雕塑艺术的广阔前景

王朝闻

雕塑艺术的广阔前景

的城市——重庆时，它所拥有的观众，不知要比展览会中多多少倍。而观众对敬爱的周副主席既崇高而又亲切的艺术形象中所受到的鼓舞和教育，也将比在展览会上强烈得多。当然，城市建筑的独特形式和独特风格，不只依靠雕塑艺术去实现，它只不过是检验整个建筑设计水平的标志之一。但是，更有内容和形式都有独创性的雕塑出现在风格不一的各个城市，或者说富有独创性的雕塑丰富了不同城市的独特风格时，才有可能满足广大群众政治的和审美的需要，也才能够使中国雕塑艺术得到长足的进展。我相信，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随着社会主义文化水平的提高，在专业和业余雕塑工作者的努力之下，雕塑艺术光辉灿烂的前景一定会迅速出现。

不破不立，要革新必须除旧。为了繁荣雕塑艺术的创作，必须继续同林彪、“四人帮”所鼓吹的修正主

义文艺谬论作斗争。只有彻底清除“帮八股”的流毒和影响，包括雕塑在内的社会主义文艺才能繁荣兴盛。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唯心形而上学猖獗一时，各种艺术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等形式主义倾向，有使观众感到厌烦和愤慨的恶性膨胀。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今天，某些形式主义流毒仍未肃清。例如，既与雕塑艺术的耐看要求相对立，又与质朴自然的民族风格相对立的所谓宣传化的人物造型，仍在不同程度地出现于新作品里。当一些专业和业余的雕塑工作者谈到提高雕塑艺术的质量时，都对“四人帮”帮八股那种装腔作势的“拿桌式”的造型结构，以“样板”自居的“舞台腔”的动作表情和弄虚作假的恶习倾向感到憎恶。主张雕塑艺术家必须熟识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应当象优秀的导演或演员那样进入角色，深刻体会本来就不是一般化而是富于特征性的人物

被重视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雕塑艺术才开始兴旺起来。但多少年来，也只是由专业雕塑工作者来做，创作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但数量少，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要把雕塑工作普及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去，由他们自己掌握这门艺术，用业余的时间，表现他们亲身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雕塑艺术的普及，会使广大群众有更多的机会看到雕塑品，通过雕塑品所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体会到他们新时代的伟大学业，为革命奋起奋勇前进。

在旧中国，雕塑是不被重视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雕塑艺术才开始兴旺起来。但多少年来，也只是由专业雕塑工作者来做，创作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但数量少，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要把雕塑工作普及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去，由他们自己掌握这门艺术，用业余的时间，表现他们亲身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雕塑艺术的普及，会使广大群众有更多的机会看到雕塑品，通过雕塑品所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体会到他们新时代的伟大学业，为革命奋起奋勇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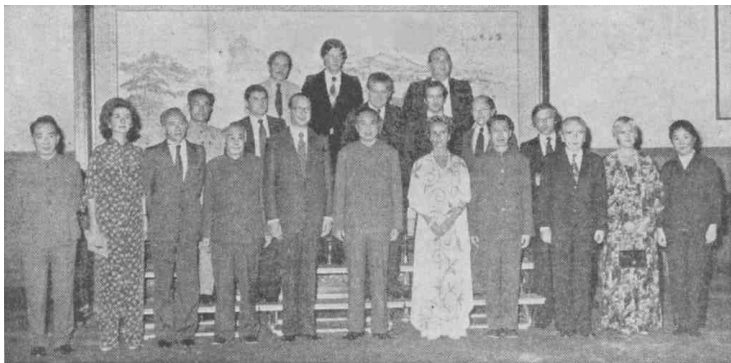
怎样使雕塑艺术适应不同的城市建设的特殊需要，怎样使形象更加典型化，怎样体现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是雕塑艺术在社会主义时代能不能百花齐放方针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承认，纪念碑雕塑在我们的城市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题材不是太广泛而是太狭窄，形式风格不是太丰富而是太单调，其中富有高度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就更少。我在这里并不是在提倡铺张和浪费，但是设想一下，象《针锋相对》这样的作品，如果经过进一步的加工，作为一座纪念碑雕塑，出现在与题材有密切联系

极好的开端。他们这次的联合展览，是雕塑界的盛事，是美术界的喜讯。我曾参观过重庆工人雕塑和黄陵县农民泥塑工作，不久前又在北京看到他们的作品，倍感亲切。他们为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华主席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塑像，充分表示了作者对无产阶级领袖和革命前辈的无比崇敬心情。工人、农民雕塑工作者，紧密配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进行创作，生活面广

阔，题材情节多，思想感情深，艺术形式纯朴生动，斗争性强。例如：《人民胜利了》、《攻关》、《甩开膀子干革命》、《书记的公案》、《横扫四害》、《尝尝新深水》、《好老师》、《向科学现代化进军》等等，都是很出色的作品。今年一月，我在重庆市的许多街头和工厂的橱窗里，看到陈列着工人的厂史和其它题材的雕塑作品。这是在别的城市没有见过的。去年十一月，我到湖北省黄陵县，在几个

的作品，出更多的人材。当然，专业的队伍和专业的队伍，要互相学习。业余雕塑工作者，要学些专业技术；专业雕塑工作者，要向业余的工作者学习，学习他们始终为革命而奋斗的创作精神，学习他们的作品富有生活气息，学习他们艺术上的深厚风格。在互相学习、紧密团结中，把我们雕塑艺术推向前进，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为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强国服务。

我看了展览会，十分佩服重庆工人、黄陵县农民雕塑工作者。从他们的作品上，受到了启发，获得了艺术欣赏。我为雕塑的普及和能够更多地为人来参加。业余的队伍建设大了，做的人多了，就容易创作更多，感到由衷的高兴。



法主席同法国前总理、巴黎市长希拉克及随同来访的其他法国客人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侨办侨联邀请归侨、港澳同胞和台湾籍妇女代表座谈 民委为少数民族妇女代表举行茶话会

新华社北京九月十九日电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今天下午邀请出席全国归国侨代会的归国华侨、港澳同胞和台湾籍同胞的代表举行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六十多人。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侨联代主席董希泉，国务院侨办副主任林修德、连贯，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出席了座谈会。

廖承志副委员长在会上首先讲话。他祝贺全国归国侨代会的胜利召开。他说，有这样多的归侨、港澳同胞和台湾籍同胞的代表参加这次归国侨代会，这显示了全国妇女的大团结、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值得庆贺的大喜事。

廖副委员长说，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由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制订的侨务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落实。但是，问题也还不少。他希望到会代表能协助检查侨务政策和对待港澳同胞、台湾同胞的政策贯彻落实情况，并积极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座谈会上，代表们畅谈了参加全国归国侨代会的感受。她们的发言充满了对“四人帮”的仇恨，洋溢着对祖国的热爱，表达了自己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尽力的决心。

新华社北京九月十九日电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今天为出席第四次归国侨代会的少数民族代表举行茶话会，祝贺第四次归国侨代会胜利闭幕。

来自五十多个民族的二百三十多位归国妇女代表，穿着鲜艳的民族盛装，兴高采烈地出席了茶话会。

民委主任杨静仁首先对第四次归国侨代会的胜利闭幕，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在今天的会上，不能不令人想起林彪、“四人帮”猖狂破坏妇女解放运动，破坏民族团结事业的罪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粉粉碎“四人帮”，我们各族人民才得到了第二次解放。华主席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把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是对少数民族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我们各民族一定要紧紧团结在华主席、党中央的周围，向四个现代化胜利进军。

蒙古、回、维吾尔、苗等族代表在会上揭批了“四人帮”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残酷迫害，热情歌颂了党中央、华主席的英明领导。有的即席吟诗，有的高兴地放声歌唱。民族歌舞团的各族演员，也为代表们作了精彩演出。茶话会上洋溢着民族团结友爱的气氛。

统战部副部长李贵、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董边和一百多位首都的民族工作者，都出席了茶话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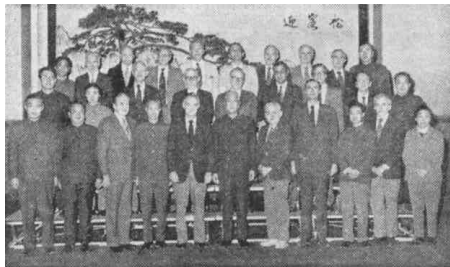
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里陶丁一行到京

新华社北京九月十九日电 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里陶丁一行，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晚乘机到达北京。

外交部部长黄华、副部长韩念

龙，有关方面负责人沈平、钱其琛、王晓云、王珍、傅顺和等到机场迎接。马来西亚驻华大使达图·拉赫曼·贾拉和夫人以及大使馆外交官员也到机场迎接。

耿飚副总理会见美报主编协会访华团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摄

新华社北京九月十九日电 五人代表团代表、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科技战线的铁人陈麓同志的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陈麓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十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五十一岁。

方毅副总理和唐克、叶志强、杨三强、李东治、蒋南翔、钱三强、张益民、李非平等同志以及冶金部各司、局和在京院、所，以及武钢、包钢、鞍钢钢铁研究所和北京工业学院等单位。

参加追悼会的有：方毅副总理和唐克、高扬文、蒋南翔、钱三强、张益民、李非平等同志以及冶金部各司、局、在京院所代表，陈麓同志生前友好、家属，共一千人。

追悼会由冶金部部长

人大代表、钢铁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科技战线的铁人

陈麓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方毅副总理送花圈并参加追悼会

唐克主持，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致悼词。

悼词说，陈麓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断裂力学专家、科技战线上的铁人、模范共产党员。他的逝世，是科技战线上的一个重大损失。

陈麓同志是福建省福州市人。一九四八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因学习成绩优异留校担任助教。北京解放后，他毅然响应党的召唤，奔赴鞍钢，参加我国钢铁基地的建设，先后担任鞍钢中试实验室物理科科长、冶金研究室副主任、金属实验室主任等职，对鞍钢的生产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五〇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党把陈麓同志调到北京钢铁研究院，先后担任

高温合金研究室副主任、金属物理室主任。

陈麓同志政治上光明磊落，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解放后的历次路线斗争中，他始终听党的话，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在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日子里，刚直不屈，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陈麓同志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热爱毛主席，热爱周总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时，他万分悲痛，不顾癌症缠身和“四人帮”的迫害，多次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对同志们倾诉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并向同志们宣誓：“对总理的怀念已不是哭泣，而是战斗。”

粉碎“四人帮”后，陈麓同志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为实现党的十一大路线和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忘我工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悼词说，陈麓同志胸怀大志，献身祖国科学事业，努力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为发展我国的新的高温合金材料提出了理论基础和新的设想，受到了国内外有关方面的重视。一九七二年，陈麓同志开始

曼内斯库总理一行离京回国

李先念副主席等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北京九月十九日电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总理马尼亚·曼内斯库一行，今天晚上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外交部

副部长余湛，中联部副部长乔石，外经部副部长汪道涵等前往机场送行。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列斯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珠也到机场送行。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日本创价学会朋友

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举行告别宴会

新华社北京九月十九日电 李先念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以池田大作会长为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野村学道先生为顾问的日本创价学会第四次访华团。

会见时，李副总理同日本朋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池田会长说，我们这次在中国访问，受到了中国朋友的亲切接待，对此深表感谢。

李副总理说，我们是老朋友，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你们来到中国访问更应该欢迎。李副总理还回答了池田会长所关心的提出的问题。

会见时在座的中国日

◇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以池田大作会长为团长的日本创价学会第四次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摄

友协副会长张香山，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赵朴初，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王曙光云。

新华社北京九月十九日电 日本创价学会第四次访华团团长、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今天晚上举行告别宴会。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和夫人经营普应出席了宴会。

池田会长和廖副委员长先后在宴会上祝酒，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日益发展。

宴会始终洋溢着热烈

友好的气氛。席间，日本朋友演唱了池田会长创作的歌曲《可爱的中国》。他们还用中国话演唱了《敬爱的周总理》。在座的中国朋友热烈鼓掌表示感谢。

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赵朴初，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季林，有关方面负责人林丽韞、孙平化、王晓云、石煜。

访华团顾问野村学道先生和访华团成员，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参赞伊藤忠一出席了宴会。

访华团将于日内离京回国。



新华社北京九月十九

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上午会见瑞典语言学家

耿飚副总理会见瑞典语言学家雅林



家贡纳·雅林，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瑞典驻中国大使比耶尔克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刘仰桥，民族研究所所长云北峰、副所长傅继斌，外事局局长唐哲，中国驻瑞典大使索力真。

雅林先生是九月四日到达北京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 耿飚副总理会见瑞典语言学家贡纳·雅林。

新华社记者摄

廖副委员长会见日本少林寺拳法访华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九月十九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今天上午会见了以日本少林寺拳法联盟会长宗道臣为团长、内山滋为副团长的日本少林寺拳法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

随后，宾主共进早餐。进餐

◇ 廖承志副委员长会见日本少林寺拳法访华代表团。

时，廖承志副委员长同宗道臣团长和夫人亲切交谈，气氛热烈友好。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李梦华，有关方面负责人李苏光、张山等参加了会见并共进早餐。

十八日晚，宗道臣团长为日本少林寺拳法访华代表团访问我国举行了答谢宴会。日本朋友将于日内离开北京，前往昆明、桂林、南宁、广州访问然后回国。

新华社北京九月十九

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今天上午会见瑞典语言学家

家贡纳·雅林，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瑞典驻中国大使比耶尔克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刘仰桥，民族研究所所长云北峰、副所长傅继斌，外事局局长唐哲，中国驻瑞典大使索力真。

雅林先生是九月四日到达北京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 耿飚副总理会见瑞典语言学家贡纳·雅林。

新华社记者摄

全国妇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名单

（上接第一版）	李克勤	李秀苗	李伯钊	李法兰	李宝光	李晋昭	李敬华
李淑铮	杨纯	杨正初	杨寿兰	杨克冰	杨秀花	杨雪梅	杨景清
杨嘉华	杨蕴玉	吴 婧	吴全衡	吴贻芳	吴亮亭	吴琳涛	吴景之
何林青	何泽慧	谷春芝	宣宜权	沈方成	沈秀爱	沈兹九	沈粹镇
宋立英	宋致敏	张凤琴	张桂兰	张永令	张志才	张芳芝	张青芝
黄金娘	张洁珣	张素我	陆士嘉	阿依夏木	张梅英	张淑义	张敬宽
张瑞芳	陆 瑾	陆士嘉	阿依夏木	阿 涛	才旦卓嘎	陈 智	陈 敏
陈建晨	陈琼英	林月琴	林巧稚	林兰英	林芳福	林眉福	林佳福
卓碧玉	罗 琼	罗建章	周 明	周 盼	周道	周宜妙	周美湘
赵 烽	赵明坚	罗叔章	郝治平	郝建秀	胡子婴	胡文秀	胡耐秋
胡德华	草 明	施如璋	施淑萍	娜 珍	贺 之	秦素萍	秦淑珍
袁 璐	莫色依洛	徐秀英	贾祖玉	夏凤珠	夏克拉	顾 霞	顾秀莲
徐 光	徐 敏	徐德高	高世珍	高首先	黄 薇	黄高庆	黄兰志
郭力文	郭明秋	郭淑珍	陶 涛	陶 涛	曹瑞武	曹瑞武	曹瑞武
黄金娘	曹海明	梅 光	梅建秀	曹冠群	曹冠群	曹冠群	曹冠群
常秀英	常香玉	崔 薇	崔 薇	章瑞英	梁克清	梁克清	梁克清
崔 薇	彭 青	彭 青	彭 青	彭 青	彭 青	彭 青	彭 青
曾小平	曾宪植	谢日妹	谢冰心	谢希德	谢雪萍	蒙美珠	蒙秀芬
雷洁琼	廖 华	廖 华	廖 华	廖 华	廖 华	廖 华	廖 华

候补执行委员五十五名（按姓氏笔划为序）

万子荣	刁春凤	马芳素	王素华	方玉珍	尹红霞	东格尔	卢广花
卢俊英	叶 明	田 瑛	兰翠珍	朱 的	任 仿	刘文敏	刘秀荣
许楠英	孙淑英	李翠萍	李翠萍	吴秀英	何春英	张 琳	张士英
孙小芹	孙连英	崔非英	崔非英	范文英	范世珍	林菊英	林菊英
周文英	郑惠英	赵金玉	赵金玉	姜学美	姜学美	郭淑文	郭淑文
梅世蓉	常北女	崔凤子	崔凤子	姜学美	姜学美	郭淑文	郭淑文

希腊马列共集会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 华主席将毛主席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新华社雅典九月十八日电 希腊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最近在雅典举行集会，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两周年。

希腊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帕帕多普洛斯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两年前茅主席的逝世，对中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是无法估量的损失。

他说，毛主席对于发展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指出，毛主席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全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旗帜。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捍卫、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还说，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进行阶级斗争指明了方向。

他指出，今天，以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华国锋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将毛主席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他指出，中国粉碎反革命的集团“四人帮”，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历史性胜利，因为这巩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为忠实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扫除了障碍。

他指出，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毛主席的教导，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正在清除“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坚定地履行其国际主义义务。

他最后说，中国的形势是非常好的，所有革命的共产党人都为中国无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欢欣鼓舞。

仲曦东团长在中越谈判第七次会议上发言

苏越合谋反华是因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搞霸权主义 越南排华是为了反华

苏越合谋反华是因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搞霸权主义

新华社河内九月十九日电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仲曦东今天在越南中越两国关于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谈判第七次会议上发言时，驳斥了越方在谈判中一再诬蔑中国“利用华人问题作为推行敌视越南政策的一张政治王牌”他指出：“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越南当局把华侨问题作为推进反华政策的一张‘政治王牌’。越南当局排华正是为了反华。”

仲曦东在发言中首先指出，中国政府的华侨政策不容置疑。他说：“我国政府为了促进和发展同华侨居住国家的友好关系，正确处理有关中国血统的人，就不再具有中国国籍。对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中国政府要求他们遵守居住国的法律，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他们的正当权益，应受到居住国政府的保障，当然，中国政府也有责任加以保护。中国政府希望华侨成为增进中国人民和有关国家人民友谊的桥梁。这是我国在华侨问题上的一贯的政策。”

接着，仲曦东团长在发言中，一项一项地驳斥了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黄碧山对中国的诬蔑和攻击。

他指出，黄碧山多次在发言中提到，从六十年代中期，即“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处于严峻而激烈的时期”，中国通过在越“华人”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输出到越南来”，“给越南造成了无数复杂的情况”。这是对中国恶意的诬蔑和攻击。

他说：我国党和政府历来认为，各国的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我们从输出革命，也从没有利用华侨搞什么反华革命活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我们从来不要别人仿效、搬用，也从干预别国的政策和路线。尽管越南领导同中国党在一些问题上有着各自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因此对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有丝毫削弱。正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内，虽然中国人民自己还存在许多困难，我们仍坚持履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为支援越南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可以无愧地说，中国人民不惜承担最大的牺牲，全力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他说：至于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在越南工作的个别中国同志曾经违背中国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做了一些错误事，但中国方面早已采取措施纠正了。对此，中国领导人已经多次向越南领导人讲过，问题早已解决。而今天越南方面却一再拿这个个别短暂的、个别的现象大作文章，并肆意加以歪曲夸大，而且捏造了许多事情，用以攻击中国破坏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这种拙劣的做法，居心是十分险恶的，那就是借华侨问题这个题目，利用谈判，诋毁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华侨政策，掩盖越南当局反华排华的恶劣行径。

仲曦东指出，越南政府代表团说中国方面在“华人中煽动‘血统’情绪，掀起要求取得中国国籍的运动”。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他说：中国对待华侨的一贯政策，在一九五五年中越两国协议中也得到体现。这个协议确认，居住在越南的华侨，经过长期耐心的说服教育，按照自愿原则逐步转为越南公民。这次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谈判中，就是主张以一九五五年两国协议的原则精神作为依据，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解决两国在华侨问题上的争端。即使在越南当局反华排华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中国方面仍然主张越南华侨根据自愿原则逐步加入越南国籍。这在第六次会议上，我们提出的四点主张中，已经阐述得十分清楚。你们对中国方面的这些建议闻而不见、充耳不闻，不正说明你们蓄意以低来诋毁中国的华侨政策吗？至于在越南全国解放后越南当局执行错误的华侨政策，采用了错误的作法，导致某些华侨对加入越南国籍产生疑虑，那不是中国方面的责任，而完全应由越南当局负责。

仲曦东还指出，越南政府代表团在发言中说，中国方面利用“华人”反对越南南方的工商业改造，并诬蔑中国“包庇和保护华裔越南人资本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他说：关于越南政府对工商业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以及其他对内政策，中国方面从未置评，更不干预。但是，越南当局借中国“改造”为名，对曾为越南的解放事业出力过、流过血的广大华侨劳动人民采取掠夺和迫害的政策，以至断绝了他们的生路，把他们大批地驱逐回中国。只是在被驱逐情况下，中国方面为了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才要求越南方面停止迫害和驱赶华侨的做法。

至于越南中国方面在越南南方华侨中有一个什么“秘密组织网”，这更是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你们一再把这个纯属捏造的东西拿到谈判桌上来，显然是为了给你们自己提出迫害和驱赶越南南方广大华侨制造借口，有意挑拨有华侨居住的国家同中国的关系。

仲曦东说：对在越南的华侨，我们主张他们在越南长期居留，同越南人民友好相处。我们这种态度是光明磊落的。可是你们却把一个友好邻邦的一九七九万侨民驱赶出境，而且现在还在继续。越南当局大量驱赶华侨的做法，在国内不得人心，在国际上也是不合理的。因此，你们才编造出所谓中国领导人“号召华侨回国”、“掀起强迫

华人迁居的运动”、给越南的建设事业“制造困难”之类的谎言，无非是妄图以此掩盖你们迫害、驱赶华侨的真相，欺瞒国内外舆论。

如果说，由于华侨被迫害和驱赶，除华侨身受其害外，还引起了越南社会、经济产生某种震荡和混乱，那责任是很分明的，就是越南当局执行反华排华政策所必然造成的恶果。这叫作自食其果。而越南方面却诬蔑中国利用“华人”问题给越南方面“制造困难和混乱”，这叫作嫁祸于人。越南当局企图用这种办法转移越南人民对其反华排华政策的不满，掩盖自己对越南人民所应负的责任，这叫做愚弄群众。

仲曦东还指出，在被越南当局驱赶到中国的十六万多人当中，有一些是越南公民。为此中国方面建议越方把他们接回越南，这本来是越南方面应尽的责任。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建议竟然也被越南当局诬为“恶毒的阴谋”，并一再宣称：“离开越南到中国去的人，不许返回越南”。越南方面故意把越南公民（包括越南的少数民族）同华侨混为一谈，目的既是为了推卸越方对自己的公民应尽的责任，也是为了混淆视听。如果说把这些越南公民接回越南会造成社会混乱，“威胁越南的安全”，你们岂不是对自己的公民连起码的信任都丧失了？你们把自己自己的公民驱赶到中国，现在又继续拒之于国门之外，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吗？

仲曦东团长在发言中谈的第二个问题是：究竟是谁把华侨问题作为一张“政治王牌”？他说：正是越南当局把华侨问题作为推行反华政策的一张“政治王牌”。越南当局排华正是为了反华。仲曦东说：越南当局在越南全国解放以后，出于对外对外政策的需要，改变了对中国的友好政策，而推行反华政策。但是，这个根本政策的改变，是违背越南人民的意志的，也是越南人民所不能接受的。中越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相互支援，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广大华侨和越南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建立起来的血肉联系，深深扎根于人民当中，中国不可能避免地成为越南当局推行反华政策的障碍。因此，越南当局不仅采用高压手段，极力割裂这种联系，而且利用华侨问题在越南人民中煽动民族沙文主义，灌输对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甚至用极为恶毒的语言诬蔑和攻击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并制造战争恐怖心理和紧张气氛，破坏中越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

越南政府代表团在这个谈判桌上，还用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些所谓边境纠纷事件，来诬蔑“中方在越南边境地区进行扰乱和挑衅”。你们无中生有地捏造了这些“事件”，并且用耸人听闻的手法大加渲染，然后又把这些不属于关于华侨问题谈判范围的虚构事件拿到这个谈判桌上来大讲特讲，这究竟是什么意图呢？这不恰恰证明你们企图把这个谈判当作反华的讲坛吗？你们现在不仅在华侨问题上大作反华文章，而且进一步制造一系列边境事件，渲染边境紧张局势，企图煽动越南人民的民族情绪，骗取人们对你们的反华宣传的注意，以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说：更为阴险的是，越南当局还极力利用华侨问题，挑拨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东南亚国家居住着众多的华侨。中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自己一贯的华侨政策，已经同一些国家通过友好协商，较好地解决了华侨问题。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正在日益加强。然而，越南当局无论在谈判桌上，还是在对外活动中和在宣传方面，大肆诬蔑和攻击中国利用华侨问题“干涉越南内政”。而苏联宣传机器也不厌其烦地发出这些恶毒的诬蔑。你们别有用心地散布了那么多的谎言，妄图挑拨东南亚国家同中国的友好关系，那是枉费心机的。

仲曦东说：越南华侨问题，也象中越边界纠纷以及中越之间的其他争端一样，都是越南当局借以反华的题目，都是越南当局反华战略的一部分。

他指出，黄碧山团长说：“越南为什么要反华呢？越南从反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这个问题提得好。的确，越南当局抛弃同中国友好的政策，奉行反华排华政策，这对越南人民是没有任何好处的。而且，我们相信，这也决不是越南人民的意愿。然而，这对现在的越南当局来说，却另当别论。抗美援朝胜利之后，越南当局自以手里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和大量的军火装备，就可以实现其梦寐以求的“印度支那联邦”计划，进而在东南亚建立霸业。为此，越南当局就发动对柬埔寨的侵略战争，阴谋颠覆柬埔寨的革命政权；向有的国家派驻大量军队，妄图控制整个印度支那，进而把手伸向泰国、老挝。

他说：越南当局为了其实现地区霸权主义，需要寻找一个靠山。其实，它早就决心把苏联选作理想的靠山。而苏联为了推行其世界霸权主义，控制东南亚国家，控制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通道，威胁日本等国的石油运输线，加强它在西太平洋同美国争霸的战略地位，也需要利用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为其效劳，发挥其“在东南亚前哨的作用”。苏联需要利用越南，越南需要投靠苏联，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搞霸权主义，因而成为它们推行霸权主义的巨大障碍。这就是苏越两家合谋反华的深刻背景和根源。

南斯拉夫议会联邦院外委会举行会议

南中领导人互访对发展国际关系作出贡献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九月十八日电 南斯拉夫联邦议会联邦院对外政策委员会十八日举行会议，讨论最近一个时期南斯拉夫的对外活动。会议高度评价了铁托总统去年对中国的访问和华主席最近对南斯拉夫的访问。

据南斯拉夫通讯社报道，在九月十八日举行的会议上代表们指出，“铁托总统去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揭开了在各个领域中发展南中两国友好关系与全面、平等合作的新篇章，同时，也是对国际关系积极发展进程的重大贡献。”

会议强调指出，“华国锋主席对南斯拉夫的访问再次确认了独立、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以及各国人民自由选择本国发展道路与国际政策的权利。”代表们指出，南斯拉夫“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以我们的不结盟政策众所周知的原则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全面合作的愿望为基础的，同时遵循了同一发展关系不能损害同第三国的关系的原则”。会议认为，“铁托总统同华国锋主席就迫切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是对巩固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

会议强调，华国锋主席的访问对今后两国全面、稳定和长期的合作是一个新的促进。会议指出，中南两国存在着发展经济合作的巨大可能性，必须采取相应的经济、财政和组织措施，以实现华主席访问期间所确定的发展经济关系的目标。

会议还讨论了南斯拉夫与西德、美国等国的关系问题。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九月十九日电 罗马尼亚政治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四日到五月二十日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辑。

这本专辑的前言说：“尼·齐奥塞斯库同志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同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在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和合作的关系中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新事件载入了史册，同时，也是对继续发展罗中兄弟团结的一个光辉贡献，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的一个贡献。”

前言说：“尼·齐奥塞斯库同志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并得到了我国全体人民一致的赞同，它再次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奉行政策的正确性，同世界上所有国家扩大友好关系已被载入党纲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和全国代表大会的基本方针中了。”

这本二百二十页的专辑，除前言外，收录了一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介绍、齐奥塞斯库总统访华时双方领导人所有讲话的全文、访问和会谈的消息报道、双方签署的协议以及各国报刊对齐奥塞斯库总统访华的消息报道和评论，并附有五十七幅照片。专辑还收录了齐奥塞斯库总统途经伊朗的消息报道以及会见伊朗国王和王后的两幅照片。

马尔科维奇主席接见我驻南大使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九月十三日电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主席德拉戈斯拉夫·马尔科维奇九月十三日在联邦执行委员会大厦接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周秋野，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在谈话中，马尔科维奇主席热情赞扬了华国锋主席访问南斯拉夫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表示将为进一步发展中南友好合作关系作出努力。

仲曦东团长在中越谈判第七次会议上严正指出

越方决心破坏谈判毫无解决问题诚意

越南团长全面否定和断然拒绝我提出的全面解决越南华侨问题的主张

新华社河内九月十九日电

在今天举行的中越两国关于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谈判第七次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仲曦东指出：“正是越南当局把华侨问题作为推行反华政策的一张‘政治王牌’。”“越南华侨问题，也象中越边界纠纷以及中越之间的其他争端一样，都是越南当局借以反华的题目，都是越南当局反华战略的一部分。”

仲曦东团长在今天的发言中，着重驳斥了越南方面所谓中国方面“利用华人问题作为推行反越政策的一张政治王牌”的诬蔑。（仲曦东团长的发言详细摘要另发）

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黄碧山在今天的会议上首先发言。他全面否定和断然拒绝了中越两国政府代表团在第六次会议上郑重提出的关于全面解决居住在越南的华侨问题的四项主张。他断言，这些主张“没有实践意义”，是中国方面“利用华人作为反对和破坏越南、对越南实行敌视的一种阴谋”。他还说，越南方面要求以一九五五年两国协议作为解决越南北方和南方的“华人”问题的基本依据，是“完全无理”的。黄碧山的通篇发

言，全是老调重弹，连一句新话都没有。

仲曦东团长在会上再次发言时指出，越南方面用非常明确的语言，断然拒绝和全盘否定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全面解决越南华侨问题的四项主张，甚至说：“由此可见，你们破坏谈判的决心确实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确实无。”

仲曦东团长应黄碧山的的要求对越南方面在九月七日第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四点进一步发表评论。仲曦东说，越方提出的四点的核心是要中国“停止利用华人干涉越南内政”。可见，越方的四点根本不能解决华侨问题的建议，而是越南当局继续利用华侨问题的谈判作为反华宣传的讲坛。“我们这样说完全是根据的，你们一再声明，‘解决在越南华人问题’的关键，是中方停止利用华人问题作为推行敌视越南政策的一张政治王牌”，否则越南就不能谈判。这样，你们实际上就把谈判的大门关闭了。”

仲曦东严正驳斥了黄碧山诬蔑中国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

胡言。他说：你们是谁拿出任何根据来说明中国推行“霸权主义”的。我们中国在国外没有派一兵一卒；没有任何军事基地；没有控制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占领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进行颠覆活动；没有利用陆海空军侵略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向任何一个国家伸手。我们反复公开声明：中国永不称霸，而且说得到，做得到。同时，我们公开声明：我们反对任何霸权主义，无论是世界霸权主义，还是区域性的霸权主义。正因为这样，惹恼了要搞霸权主义的人，他们把中国视为推行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集中了最恶毒的语言想把中国骂倒，但是中国依然屹立在地球的东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就是这样的，难道你们也要学它的样子，步它的后尘吗？

仲曦东说：“黄碧山团长一再问我，说越南奉行地区霸权主义有什么根据？我且举几例：你们派重兵长期驻在邻国；你们图谋控制一个友好国家；你们侵占柬埔寨的威岛；你们不断对柬埔寨搞颠覆；你们动用陆海空军向柬埔寨发动了侵略战争，至今还在继续；你们同

东盟国家伸手，拚命挤进去，妄图改变东盟的性质；你们充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伙伴，为其推行‘亚安体系’效劳出力；你们配合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反华。”仲曦东还引证了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党的机关报《人民报》总编辑黄松最近向法国记者讲的一段话，证明越南当局早就对柬埔寨怀有野心。黄松说，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二年期间，“当时越南有几个师在柬埔寨，而柬埔寨的部队人数。如果我们那时进行干预，现在的局面就会不一样了。也许我们现在正在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仲曦东指出：“这真是再好不过的区域霸权主义的自供状和自我写照。”“黄松先生的这番话，意思是说‘当年未动手’，‘悔不当机’”

黄碧山对黄松的话未敢否认，但又辩称说，黄松“是以记者身份对外国记者讲的”。当仲曦东问他，黄松究竟是哪越南党内有地位的负责人呢，还是一名记者？黄碧山无言以对。但他在随后的发言中大动肝火。仲曦东团长劝他“稍安毋躁”。

今天的会议上午九时在河内开始举行，于下午一时一刻休会。

